

举这样一个例子，不是想把潘先生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化约为某种庸俗化的学科意识。相反，如果我的叙述基本上反映潘先生思想的某一侧面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旧著重读的例子，为我们进一步表达了另外一种体会。最近，在一次私下的聊天中，有新一代哲学家发出发展“中国思想”的号召，“鼓吹”我们的学术需要自主地寻找我们文化的根。对于“中国思想”的定义，我的理解不是十分明晰。但是，对我而言，潘光旦先生的那种综合、那种“人文史观”的表述，离我感觉中的“中国思想”最近。与我们这代人有“代沟”的潘光旦，他的思想提出得很早，我们这代人对他的年代和世界，可能也很难再加经历，但他的洞见远非过时，因为从潘先生那代人到我们这代人，“中国思想者”没有停止地需要面对一个“人文史观”的问题：人文世界的合理格局，如何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中得以确立与传承？在1951年那个特定的年代，潘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着特定的限定。面对一个努力在历史上不平等的“天下”之中，如何真正实现民族及文化间平等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是潘先生当时提出来希望具有“位育优势”的知识分子加以深入讨论和“检讨”的论题。五十年过去了，这个论题似乎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天，有更多的学者跟随着时代的变化来界定我们的“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的任务。于是，在“全球化”的声涛中，在“西部开发”的号召中，我们再次进入了值得我们像潘先生那样去进行“历史检讨”的时代。而我能看到，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应轻易地认为，潘先生指出的那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已不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也仍然不应轻易地认为，它对我们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再没有制约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我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多少人能像潘先生那样来“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在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反思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论点、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少数民族”？另外，在近期的“跨文化对话”的讨论中，有多少中国学者能像潘先生那样，基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和人文身份，来展望这个世界，真正从文化之间的“互惠”关系中理解我们的文明史的地位？

参考文献：

- 费孝通，1999a，“反思对话 / 文化自觉”，《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费孝通，1999b，“推己及人(代序)”，《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潘乃穆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潘光旦，1995，《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潘光旦，2001，《潘光旦文集》1—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 潘乃谷，1999，“潘光旦释‘位育’”，《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潘乃穆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要学习知识与技能，但更需要学习如何做人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

《潘光旦文集》十四卷的出版，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潘先生过世已经34年了，中国社会在这34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当年写下的文字，我们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处处



都有启发。在这些写于几十年以前的文字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精辟的学术观点，也感受到潘先生做学问的严谨学风和他做人处世的态度与风范。

上个周末，北京大学召开了教学工作会议，讨论北大今后本科教学体制的改革，强调要实行从专业教育向基础教育的转变，提出要培养创造性人才，这些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讨论本科招生与学生管理的具体办法，讨论改革选课制度，这一改革对于北大未来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大家在讨论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大学应当如何把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

我近日读潘先生《文集》第八卷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教育制度的修正》。1934年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有一个修正教育制度的提案，提出学校要采取双轨制来同时培养做学问和做职业这两种社会上都需要的人才。潘先生认为只有这一提议“还嫌不够”，指出这两部分人才在做事的同时，“也都要做人”，而“究应如何做法，目前的教育制度却还没有理会”。他特别强调“要知只有在‘做好人’的共同目标之下，做学问的人与做职业的人之间才彼此可以不相倾轧，可以和衷共济。以前的旧教育对于这一点倒是承认了的，无论忠孝节义一类的道德理想，在今日看去，是怎样的不合时宜，但在往日，凡是能忠、能孝……的人，不论其所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其为无忝于做人之道，其为同样可以受到当时与后世的景仰则一，否则，无论一个人有多大学问，也还要受人唾弃。……孔子的全部教育学说是两个字——做人，做学问、做职业，都是余事。以做人的原则来绳蒋氏等的教育提议，就觉得它很不够了”（2001：602）。

上面这段文字读后，感触颇深。我们在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学问做得不错、甚至是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但是恰恰不懂得如何做人，不懂得对周围的人给予起码的尊重。“文化大革命”是把要“做好人”的那些传统上的道德伦理（所谓“中庸之道”、“己所不欲，无施于人”）都批判得干干净净的，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鼓励人们相互批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且在这种斗争（潘先生称之为“倾轧”）中反而把别人的宽容看成是弱点而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无论表面上讲得多么冠冕堂皇，骨子里追求的却是权力和利益。如果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不断地多起来，那么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社会。在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时，重温潘先生在67年前写下的这些话，我觉得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而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并不是开出来几门政治课就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学校里目前的政治课，讲的主要也还是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并不重视做人的基础道德。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在急剧变化之中，我们尤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教育中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潘先生的十四卷文集，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学术遗产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其自身的历史。我们这些解放后出生的一代，需要从老一辈学者那里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不但要学习他们的知识，更需要学习他们如何做人，学习他们为人处世的道德与精神。

【部分有关报刊新闻报道及署名文章选编】

